

# 论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建构<sup>\*</sup>

陈昌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大趋势。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尤其引人注目。许多曾被视为国家主权范围内部的事务,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护身符,被裹挟进全球化大潮。有人对此拍手称快,认为主权这种制度安排已经无法适应当代的现实,它最终被超越乃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一背景下,很多人都在谈论“主权的终结”、“民族国家终结”的前景。当然,也有人在为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做坚持不懈的辩解,声称主权大坝将在全球化潮流的冲击面前岿然不动,而这道大坝闸门的频繁开启与关闭恰恰证明了它对洪流的反应是多么灵活与及时,从根本上说,大坝象征着对洪流的控制,它给我们带来安全与稳定。在当前关于全球化进程与国家主权关系的争论中,全球化进程与国家主权的二元对立已被预设为争论的前提。

其实,要想认清国家主权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演变趋势,很重要的一点是理解国家主权这一制度形式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它的具体内容在不同

---

\* 本文属于国防大学江凌飞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安全维护”的子课题。

历史阶段又是如何演变的。如果我们把目光超越过 20 世纪末全球化进程的这一最新阶段,从历史的更深处去探寻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相互关系,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比二元对立这种概括复杂得多。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主权国家体系才真正覆盖了全球。因此,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主权国家(尽管其具体内容在不断变化)能够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

### 一、国家主权制度变迁的理论 解释及相关概念界定

对于主权国家的兴起与发展,有军事安全、经济—制度主义和文化观念三种解释模式。

军事安全的解释认为西欧绝对主义国家(主权国家的原型)的兴起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各政体间长期军事竞争压力产生的结果。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军事技术领域的变革,引起了战争形态的变化,大规模步兵取代了中世纪重装骑士在作战中的地位,从而导致了各封建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sup>①</sup>;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军事竞争压力使得各国都高度重视对国内资源的提取,这就进一步改变了封建国家内部的统治结构,使国家形态由封建型向现代型转变。<sup>②</sup>军事竞争带来的国际结构性影响则是各国在竞争中趋同,国家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向它的竞争对手学习,那些不适应竞争压力的政体形式逐渐被淘汰掉了。<sup>③</sup>最终西欧各新型绝对主义国家在竞争中形成了大致的均势,各国相互承认主权,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取代了中世纪封建体系成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形式。军事安全的角度对于西欧主权国际体系的形成是非常有解释力的,但是用来解释西欧以外主权国家的形成就困难得多:也许近代日本作为主权国家的兴起还可以套用此模式来解释,但是对于 19 世纪的拉美各国、20 世纪的亚非各

①: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5—81.

②: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 Evans, D. Rueschmeyer and T. Skocpol, ed.,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83—186.

③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9—103 页。

国最终成为主权国家的演变轨迹,军事安全解释模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济—制度主义的解释是军事安全的解释的延伸。在持续的军事竞争压力下,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换取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撑日益庞大的国家军事机器。国家既要持续不断地从国内社会提取财政资源,又要有效保护国内经济,使其不至于受到过度压榨。<sup>①</sup> 为了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早期绝对主义国家开始重视保护私有产权、采取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以此来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制度主义的解释还特别强调主权国家这一制度形式与帝国、城市国家、城市联盟等其他政体形式相比较的优势: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国内统治者与社会之间,主权这一制度形式是解决阻碍行为体间合作与协调的三个难题(交易成本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委托—代理问题)的最优选择。<sup>②</sup> 另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经济—制度主义解释则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并不是现代国家主权,而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王朝主权。17、18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异质性的国际体系,王朝主权占有主导地位;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各国才普遍完成了从王朝主权到现代主权的转变。推动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产权关系危机带来的阶级冲突:17世纪的英国在这场阶级冲突中完成了从王朝主权向议会主权的过渡,成为第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并有意识地推行了一套与旧的王朝主权国家不同的对外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西欧主权国家体系的转变。<sup>③</sup> 第一种经济—制度主义的解释与军事安全的解释遵循着类似的逻辑,即外部竞争压力以及国家间的互相学习模仿导致内部制度变迁,最终使主权国家在中世纪晚期诸多政体形式中脱颖而出。第二种经济—制度主义解释的时间段更广,并且注意到了主权制度内容的演变。但是这两种经济—制度主义解释模式都存在与前一个模式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对西欧以外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解释力相对较弱。

<sup>①</sup>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UK: Blackwell 1990), pp. 67—95.

<sup>②</sup> Hendrik Spruyt,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2—33.

<sup>③</sup> Benno Teschke, "Theorizing the Westphalian System of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solutism to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Vol. 8, Issue 1, pp. 5—8.

文化观念的解释是对前两种解释的挑战。这种解释注意到主权国家的大量出现有两次高潮:一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西欧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相互承认主权的国家;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后殖民运动中诞生了大批新的主权国家。文化观念的解释认为,这两次主权国家诞生高潮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分别是先前两次思想观念领域的重要革命:15世纪以来的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以及19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sup>①</sup>这种解释的优点一是其解释范围和历史时段大为扩展,超越了西欧的狭隘范围,对历史上国家主权的发展演变做出了统一的解释;二是注意到了文化观念这个长期受到忽视的变量对国家主权的作用。观念解释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思想观念领域的变革可能是国家主权制度演变的必要条件,但很难说是充分条件。例如,观念的解释模式很难说明为什么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另一方面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思潮的成熟程度又极为不同,但是恰恰直到二战结束后大批殖民地才几乎同时成为主权国家。

以上三种解释虽有各自的不足,但是它们为进一步研究国家主权发展演变的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国家主权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做出一种统一的解释。这种统一的解释模型就是全球化进程。回顾历史,人们可以发现,16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与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本文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全球化历史进程对主权国家体系具有决定性的建构作用,它不仅从形式上决定了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而且还在不同历史时期深刻影响了国家主权的具体内容。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都是极富争议的概念。不过,为了实证研究方便起见,我们还是设定关于国家主权和全球化进程的“理想类型”。本文对国家主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把主权区分为四个方面:强调相互承认的“国际法主权”,强调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强调对内合法有效控制的“国内主权”,以及强调对跨国界运动控制的“相互依赖主权”。<sup>②</sup>本文对主权的定义借鉴了

<sup>①</sup> Daniel Philpott, *Revolution in Sovereignty: How Ideas Shape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10.

<sup>②</sup>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25.

这一思路,所指的主权“形式”即相当于克拉斯纳的“国际法主权”,16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取代了城市国家、城市联盟、王朝、帝国等其他政体形式,成为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惟一合法政体形式;本文所说的主权“内容”即相当于克拉斯纳的“国内主权”与“相互依赖主权”,它又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什么是国家主权对内的合法形式,是绝对君主制国家还是大众民主型国家?二是国家主权对跨国界的人员、商品、资本流动的控制程度。由于克拉斯纳所说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与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关系不大,因此被省略掉了。

对国家主权“形式”发展演变的观察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最简单的衡量指标就是不同历史时期主权国家的数量。对国家主权“内容”发展演变的观察相对比较复杂,这里本文再次建立了两类理想类型:对不同历史时期主权国家的对内合法形式,可以大体划分为君主—威权型主权国家以及人民—民主型主权国家;对于主权国家对跨国界运动的不同控制程度,可以划分为自由放任型国家和重商主义型国家。<sup>①</sup>

关于全球化,本文参考了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全球大变革》一书的研究。赫尔德等人指出,“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进程或者一组进程,而不是单一的状态”,它是“一种结构化和分层化过程”,是“一个分化的、多面的进程”<sup>②</sup>。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本文把全球化进程设想为一个具有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进程模型。这同样是一个大为简化的理想类型:在本文的模型中,全球化进程只涉及军事安全、经济、文化观念和制度四个方面,它的层次性主要体现为“中心—边缘”模式,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大体划分为原初全球化(1500—1789)、19世纪的全球化(1789—1914)、20世纪的全球化(1914—1989)和当前的全球化(1989至今)四个阶段。

衡量军事全球化的指标是某一历史时期主要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竞争,特别是有大国卷入的国际战争。至于武器技术的扩散、武器贸易以及军事投送能力的全球扩张当然也属于广义上的军事全球化,但是出于简化的考虑,

<sup>①</sup> 当然跨国界运动远不止经济方面的内容,但是把问题限制在经济方面有助于进一步简化,而且经济方面的跨国界运动也确实是最有影响力的。另外,这里“自由放任”的含义与通常的用法稍有不同,它既指一个国家自愿的行为,也包含被迫的选择。

<sup>②</sup>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本文省略这些内容;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世界各地在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相互联系的加强;文化观念的全球化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某种思想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制度的全球化指的是对全球化其他各个方面加以规范的国际制度。全球化进程当然远不止这四个方面,但是对于国家主权来说,全球化进程的这四个方面带来的影响最为深刻。

16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一种“中心—边缘”的发展模式,中心地区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边缘地区则伴随着中心地区在军事、经济、文化观念等领域的扩展而逐步卷入全球化进程,因此,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中心地区军事、经济、文化观念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比较高,而中心—边缘的全球化则主要是一种单向依赖的关系,边缘地区之间也是通过它们各自与中心之间的联系而连接在一起的。

由于全球化各个侧面的发展是不同步的,所以很难给全球化进程划分准确的历史阶段。本文对全球化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以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节奏为标准,用某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作为阶段划分的标志。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全球化,从军事方面来看,表现为西欧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军事竞争:前有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中有英荷、英法之间的争霸战争,最后以拿破仑战争宣告这一阶段的结束(因此如果单从军事角度来说这一阶段结束于1815年)。从经济方面来说,西欧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比中世纪更为密切,但此阶段各国普遍追求的仍然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度不高;另一方面,西欧各国在这一阶段开始向美洲、亚洲、非洲进行殖民扩张和资本原始积累。从经济角度来说,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到18世纪下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即告一段落。从1789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黄金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西欧列强都不遗余力地进行海外扩张,但是它们之间的直接军事竞争水平大为下降。在经济领域,在当时头号强国英国的推动下,自由贸易占据了上风,世界生产、贸易、投资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89年冷战结束,20世纪连续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在这个阶段,军事安全领域的全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心区列强之间激烈对抗,世界其他地区也几乎被全部卷入这种对抗冲突当中;与此相反,前一个阶段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势头在这

一阶段被中断甚至逆转了,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制度为经济全球化势头的恢复创造了条件,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强劲。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大国之间的全球军事竞争与对抗大为减弱,而经济全球化在这一次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导方面。此外,在全球化的四个历史阶段中,与军事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具有交替主导的节奏性特征不同,文化观念的全球化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至于全球化的制度方面,发展的则相对比较晚,19世纪仅有若干萌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调节全球化的国际制度才开始大量出现。

## 二、1500—1789年的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 (一) 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特点

全球化进程肇始自文明间均势的失衡,它的发展又加剧了这种失衡的态势。全球化进程并不简单等同于全球各地区联系交往的加强。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往来早在全球化进程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联系与交往的方式既有贸易也有宗教传播与战争,而且这种交往也在不断密切和加强。但是总的来说,在近代全球化进程开始之前,全球性的联系是松散而有限的,世界是由几大基本独立地区文明组成的。全球化进程是16世纪以后的一种全新现象,它的主导者是西欧,背后的逻辑是资本扩张,这是从前全球性交往与联系中不曾存在的特点。

但是,如果我们要探寻全球化进程出现的原因,那么仍然要从早在16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全球性联系入手。16世纪初,在世界几大文明竞争的态势中,西欧的基督教文明偏居欧亚大陆的西北角;东欧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沉睡的蒙昧状态;当时看起来最有活力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在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以后,仍在从南部持续不断地向基督教世界发起进攻;在更为遥远的东方,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和中国的明王朝都具有令欧洲人仰慕不已的文明与财富。

历史上,西欧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之间早就存在贸易往来。但是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西欧与东方的贸易联系通道被切断了,西欧必须找到绕开奥

斯曼土耳其控制的通往东方的新航道。除了贸易上的考虑之外,宗教情绪也是推动西欧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①</sup>综合来看,西欧对新航路的探索乃至全球化进程的发轫,是其对奥斯曼土耳其崛起做出的一种反应。因此,早期全球化进程发动者的角色由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来扮演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里在历史上是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对抗最激烈的地方。这一进程启动之后,在它背后资本扩张逻辑的支配下,西方世界在文明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殖民主义是全球化原初时期的重要形式。这一时期以前各大文明间的全球交往,无论其内容是贸易还是战争,交往的各方起码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在这一时期以后的全球化,已经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体系当中,无论其实质上是多么的不平等,但在形式上也表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交换。而这一时期全球化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经济性质与暴力性质的奇特混合:它既是平等的交换,又是赤裸裸的掠夺,这就是殖民主义。

这一特点与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是完全吻合的。马克思曾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sup>②</sup>原初全球化时期西欧对美洲的殖民掠夺给世界带来了广泛的影响。“美洲的金银在欧洲市场上的出现”,推动了西欧“工业的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兴旺发达和货币的活跃流通”<sup>③</sup>,加速了西欧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步伐。伴随欧洲国家对美洲的殖民掠夺,出现了欧洲、非洲、美洲之间的三角贸易:欧洲国家把非洲的黑奴贩运到美洲,再从美洲输入农产品和工业原料,最后把制成品贩卖到非洲、美洲乃至亚洲,从而造成了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国际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

同时,军事全球化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主导方面。根据杰克·利维

---

① 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参阅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的研究,在1495年至1975年间共爆发过64场有两个以上主要大国参与的战争,其中在1495到1815年间就有55场。<sup>①</sup>另一项统计则更进一步精确指出了这一时期欧洲国家之间战争爆发的频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1480年至1550年70年间在欧洲发生了48次主要战争,1550年至1600年50年间就有48次,而从1600年到1650年50年间则增加到116次。1650年至1700年共发生了119次主要战争,1700年至1750年上升到276次,而从1750年到1800年又增加到509次。<sup>②</sup>

这一时期欧洲国家间的军事竞争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争夺(反对)欧洲霸权的战争,另一方面是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作为最早的殖民国家,西班牙在竞争中最初处于优势地位。西班牙王室通过联姻形成的哈布斯堡王朝一度控制了西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这引起了法国、英国对欧洲大陆出现单一霸权国家的恐慌。法国、英国先后开始奉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大陆的政策。此外,哈布斯堡王朝自身的过度扩张引起了尼德兰革命,这也是造成西班牙衰落的根源之一,从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消灭,一直到1659年西班牙败于法国后签署《比利牛斯和约》,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在和后起的英国、法国的竞争中以彻底失败告终。与此同时,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既是一场由宗教问题引起的德意志内战,又是一场有法国、荷兰、西班牙、瑞典等国参与的带有争霸性质的欧洲国际战争。这场战争的一个后果就是确立了主权原则,同时维持欧洲大陆均势成为各国的共识,从此以后,任何一国独霸欧洲的野心,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

大致以三十年战争为界,早期全球化引发的国家间竞争的舞台由欧洲大陆霸权转向了海上霸权以及辽阔的殖民地世界。马克思曾评价道,在这一时期“商业和航运比起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

<sup>①</sup> Jack Levy, "Historical Trends in Great Power War, 1495—197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2, No. 2, 1982, pp. 284—285.

<sup>②</sup> Benno Teschke, "Theorizing the Westphalian System of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solutism to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Vol. 8, Issue 1, p. 12.

来进行和解决的”<sup>1</sup>。这种竞争在17世纪下半叶的主要表现是1652年至1674年之间的三次英荷战争,在18世纪则主要表现为英法之间围绕对北美洲、非洲和印度殖民地控制权展开的争夺,18世纪英法斗争以英国在殖民地世界全面获胜而告一段落。至此,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帝国确立起来。

### (二) 国家主权在这一时期的建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缓慢启动,主权国家在欧洲开始逐步取代其他政体形式,成为新的国际体系当中最基本的单位。16世纪以前,欧洲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中世纪性质的。“构成中世纪欧洲的成分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具有同一性的政治单位——国际性国家体系,其政治版图必然是相互重叠、犬牙交错的,不同的司法诉讼程序在地理上相互缠绕、分层,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誓忠、不对称的主权、不规则的飞地”<sup>2</sup>。当时欧洲国际舞台上行为主体五花八门,包括主权城市、诸侯国、帝国、封建王国、教会等等。拉格把这种国际体系称为“异质性”制度性框架,以区别于现代国际体系的“主权”制度性框架。<sup>3</sup>在中世纪晚期西欧各种不同类型政体的竞争当中,绝对主义国家最终脱颖而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因为绝对主义国家这种政体形式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能适应当时环境的挑战。

13—15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场全面的封建主义危机,欧洲国家不论大小,普遍受到了财政危机的压力。各国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来源,开征新的税收。16世纪的西班牙以及稍后一些英国、法国,正处在从封建主义国家形态向资本主义国家形态过渡的中间阶段。绝对主义国家是这一时期典型的国家形态,它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由于受到国内封建义务的束缚,这些国家从税收中获得财政收入的能力都非常有限,因此,对外扩张成了这些国家君主获得收入的主要手段。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言:“它们主要是为了战争而组建的机器。”<sup>4</sup>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2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3 约翰·拉格:《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走向新现实主义综合》,载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4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18页。

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出现,是理论领域对绝对主义国家的呼唤。反过来,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不过是国家主权观念的现实表现。例如,现代主权理论的先驱博丹(Jean Bodin)指出:“主权是创制新法律并使其臣民无条件服从的权力。从本质上讲,君主和绝对权力的主要标志就是无须征得臣民同意而将法律强加于其头上的权利。”<sup>①</sup>

在现实中,绝对主义国家的建立极大克服了外部环境的挑战,这些国家在内部取消了国内关卡,创立了外贸关税以同外国竞争者抗衡,通过收回教会土地开发了农村的财富,此外,它们创立了殖民地企业和贸易公司,并且通过战争手段直接掠夺财富。

与当时其他政体形式相比,绝对主义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首先,绝对主义国家的崛起加剧了国际间竞争的态势,国际体系呈现出一种国家间相互为敌的“霍布斯状态”<sup>②</sup>;其次,“竞争的结果是,竞争者之间趋于相同”<sup>③</sup>。换言之,长期的国际竞争逐步淘汰掉了那些不适应的政体形式,使主权国家成为国际体系内部惟一的政体形式。

这一时期以绝对主义国家形式出现的主权国家政体,除了有利于帮助各君主国克服内部危机、应对外部挑战、参与国际竞争之外,还在更深层次上适应了全球化进程的要求。

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推动的。在西欧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这一阶段,以海外殖民掠夺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进程和对国内农民及公地的掠夺一起,构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两个方面。而成功地把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并同时加以推动的,就是国家主权。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在英国……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

<sup>①</sup> 约翰·拉格:《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走向新现实主义综合》,载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40页。

<sup>②</sup> 关于国际体系中“霍布斯文化”的论述,参阅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349页。

<sup>③</sup> 肯尼思·沃尔兹语,见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17页。

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sup>1</sup>。

主权国家不仅作为一种可见的权力、作为公开或隐蔽的暴力,直接推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作为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为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欧中世纪晚期罗马法的复兴一方面在私法领域引入了绝对的、无条件的私有财产权观念,另一方面在公共法领域引入了主权的观念。<sup>2</sup> 拉格在比较了私有财产权和主权两个概念后指出:“近代早期对产权的在界定以及政治空间的重新组织,不但催生了国家间政治关系,而且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sup>3</sup> 斯普鲁特(Hendrik Spruyt)则认为,主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无论从国内的角度还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都有助于解决经济领域的协调与合作问题,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sup>4</sup>

总之,主权国家这一新的制度安排既推动了西方对非西方世界殖民掠夺的全球化进程,又促进了西欧国家自身内部的资本主义化进程。

如果说以绝对主义形式出现的主权国家在16世纪还只是一种个别现象的话,那么随着其后西欧绝对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主权原则逐步在西欧国家内部之间确立起来,成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准则,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西欧各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确认了主权原则:在主权国家之上不存在任何权威,而各个主权国家之间则是独立与平等的关系。自此之后,主权原则就具有了超越个别国家之上的国际体系层次的含义,成为国际体系的文化,国际体系由其内部成员相互敌对的霍布斯状态,进化到相互承认基本生存权利的洛克状态。<sup>5</sup>

绝不能低估主权原则由个体层次提升到体系层次的意义。就个体层次而言,尽管确立起主权原则的绝对主义国家在西欧或许算得上一种全新现象,但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6页。

2.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12页。

3. 约翰·拉格:《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走向新现实主义综合》,载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39页。

4. Hendrik Spruyt,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Decline of the Modern Stat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2002, pp. 138—140.

5. 有关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过渡以及洛克文化一般特点的论述,参阅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50—369页。

是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如果主权仅仅意味着国家具有独立的、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力的话,那么它毫无新奇之处。形形色色的古老帝国几乎都拥有这种权力。现代国家主权原则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存在于一个国际体系之内的原则,一种需要主体间相互确认才能实现的原则。现代国家主权的这种特殊性质,从原则上确保了国际体系不至于向帝国转化。当然,仅仅原则上的保证还是不够的,均势正是在实践中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再保险。因此,尽管大国的均势政策常常会以牺牲弱小国家的主权为代价,但均势原则在最终目标上与主权原则是一致的:防止国际体系演变为单一帝国体系<sup>①</sup>,而单一帝国恰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是对立的。<sup>②</sup>从长期来看,政治上的主权国家体系和经济上统一的世界市场并不矛盾,它确保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效率。

### (三) 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与国家主权相互关系的特点

原初的全球化进程与主权国家体系具有共同的中心—边缘模式。一般认为:“15世纪末……各主要世界文明中心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sup>③</sup>从前全球几大文明中心之间的相互交往一方面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又是大体平等的。16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它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呈现为中心—边缘的发展模式。西欧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世界其他广大地区则是被逐步卷入这一进程当中的。从经济上看,在这一进程中,西欧是工业、贸易、金融的中心,而世界其他广大地区则作为原料产地、奴隶供应地和金银等贵金属产地依附于中心;从军事上看,西欧作为侵略者和殖民者把世界其他地区作为边缘纳入自己的统治。

与此相对应的是,主权国家体系也首先出现在西欧。西欧国家在相互承认主权的同时,从实践和理论上否定了其他地区国家的主权地位。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印加帝国的侵略当然可以看作是对其“事实上的”主权的侵犯,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西欧主权国家的兴起,这些国家还明确地从观念上否认了其他

<sup>①</sup> 赫德利·布尔指出,均势的首要作用就在于防止国际体系演变为一个世界帝国。参阅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9页。

<sup>②</sup>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庞卓衡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

<sup>③</sup>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国家的主权地位,它们认为“像东方的王国、伊斯兰世界的酋长国以及非洲的部族等等那样的政治实体则应该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sup>①</sup>。

因此,如果说全球化进程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打破了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均势,那么西欧的国家主权原则从政治上和观念上打破了这种均势。两者的结果是一致的,它们共同造就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模式。

全球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包括许多方面,尽管如此,早期全球化进程和主权国家体系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范围上看,都是初步的。从经济上来看,重商主义仍是这一时期各国普遍采取的经济政策,即便是在西欧,国际贸易以及国际金融的发展水平也非常有限;政治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还局限在西欧很小的范围以内;军事意义上的全球化虽然是这一时期全球化的主要方面,但是它也远没有达到高潮,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征服只能算揭开了序幕,西方国家内部的军事竞争的强度也远比后来逊色。

全球化进程与国家主权的这种初级状态与当时西欧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造成后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那些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仍然处在孕育的过程中。到了18世纪末,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三、1789—1914年的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随着资产阶级在西欧国家获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确立了下来,资本的逻辑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最主要动力。诚如马克思所言:“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sup>②</sup>与前一个阶段的缓慢发展相比,全球化进程在资产阶级统治确立之后的1789至1914这个“加长的”19世纪获得了加速发展,与之相应,国家主权在这一阶段也发生了新的演变。

#### (一) 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特点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进程的速度大为加快。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①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原初全球化时期的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优势。然而到了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把非西方世界远远甩在了后面。工业革命从两方面给全球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一方面,工业革命的一系列发明创造直接加强了西方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手段。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其势力只能影响到非洲的某些沿海地区。工业革命后出现的蒸汽机轮船和铁路把各大洋和各大洲联结为一个整体,而这一时期军事技术的发展更使西方有恃无恐地对非西方世界推行炮舰政策。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的诗句“我们拥有/马克沁机关枪/而他们没有”正是这一时期的写照。另一方面,工业革命所开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西方国家对开发世界市场有了更加迫切的需要,同时也更加依赖于世界各地的原料供应。经济方面的全球化从主要以国际贸易为主发展到生产的全球化。“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sup>①</sup>

相比于早期全球化十分有限的范围,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进程涵盖了整个世界。西方国家除了对美洲大陆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控制以外,对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内陆地区的影响很小。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凭借船坚炮利的优势,迅速向各大洲内陆地区扩张,全球化进程经历了由“点”到“面”的扩展。在这个阶段,西方世界首先是在印度建立起全面的殖民统治,随后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9世纪后半叶,更是掀起了瓜分非洲大陆的狂潮。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整个世界已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

经济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主导方面。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水平在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潮。在国际贸易领域,英国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令》,从此开始奉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有力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据统计,整个19世纪国际贸易经历了持续的稳定增长:1820年至185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3%,1850年至1870年为5%,1870年至1914年为3.5%。<sup>②</sup>在金融领域,在古典金本位制度下,20世纪初世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21世纪初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sup>②</sup> 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第217—218页。

今天。在生产领域,同样也出现了国际分工和联系的紧密化。

军事全球化的势头与前一个阶段相比已经大为减弱。从1816年(拿破仑战争后)到1899年共发生了103次国际战争,其中包括73次殖民战争。殖民主义虽然仍是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这一时期的殖民主义与早期全球化阶段西班牙式单纯暴力掠夺的殖民主义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并不在于殖民主义破坏性和野蛮程度的降低,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阶段的殖民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展开的。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时曾公正地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sup>1</sup>“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sup>2</sup>

这一阶段全球化进程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方面是思想观念的全球传播。如果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段还仅仅是西欧范围内思想领域变革的话,那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在整个“加长的”19世纪,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民族主义等源于欧洲的思想观念开始逐步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这种思想观念领域的全球化影响极为深远,它为后来非西方世界觉醒并最终推翻殖民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思想观念领域的全球化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其发展和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一样,也是不平衡的。不过,全球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大致以美国独立革命开始、以俄国十月革命告终,却有着格外的象征意义,它在反复预示着:西欧国家最先发明出来的思想观念上的武器,终究有一天要被西欧以外的地区拿来对付自己。

### (二) 这一时期国家主权演变的特点

这一时期,“主权在民”与“民族自决”这两条原则取代了君主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新内涵,民族主义成为主权国家建构的主要内容。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洛克、卢梭等人就已经在理论上围绕国家主权的来源、人民权力与国家权力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8页。

2 同上书,第68页;Meredith Reid Sarkees, "Inter-state, Intra-state, and Extra-state Wars: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ir Distribution over Time, 1816—1997,"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2003, p. 61

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思考。法国大革命中发表的《人权宣言》明确宣称：“各民族均享有独立主权，无论其民族大小如何，人种为何，疆域何在。人民的主权是不能加以剥夺的。”<sup>①</sup>这种包含着“主权在民”与“民族自决”两块基石的崭新的主权观对后来国际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的思想相结合，在这一时期国际体系内不同的地区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中心区如英国，由自由主义主导的民族主义起到了驯化国内危险阶级的作用，推动了国内政治民主化。<sup>②</sup>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次民主化的长浪潮。<sup>③</sup>对于当时处在国际体系半边缘地位的美国、德国来说，民族主义使它们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并且建立起国民经济参与全球竞争；对于处在更加边缘化地位的地区和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像先进国家那样取得民族独立、实现政治民主成为这些地区的普遍追求。

同时，西欧以外的主权国家开始崛起，加入到国际体系当中。随着全球化进程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国际体系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原来属于体系边缘和体系外的地区也取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

在欧洲内部，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后，仍处于绝对主义国家阶段的俄国就逐步加入到欧洲体系当中了。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俄国已经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一根重要支柱；另一方面，三十年战争以后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在19世纪中期获得了统一，成为国际体系当中的新兴强国。

在欧洲之外，美国获得独立以后，利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列强无暇顾及美洲的时机，加紧在北美大陆的扩张，此外，美国还逐步建立起对整个美洲大陆的霸权，并以《门罗宣言》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这标志着在欧洲之外出现了“以非欧现代强国为中心的非欧现代区域性国际体系”<sup>④</sup>。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东亚，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立即开始

① 转引自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② 参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郝明伟、张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135页；以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0页。

③ 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16页。

④ 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对外侵略扩张。19世纪末期,日、俄、美、英在东亚的利益角逐造就了东亚太平洋国际体系。此外,拉美各国也在19世纪上半期推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取得了主权国家地位。

原先处于欧洲国际体系边缘的俄德以及处于欧洲国际体系之外的日美在19世纪的先后崛起,一方面使得国际体系的范围从欧洲扩大到了美洲和东亚,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际体系内部列强的竞争,为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英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国家,有意识推行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有人曾经这样描述英国在当时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自由流动的单一体系中发展了起来,在这一体系中,资本和商品的国际交换主要是通过英国及其机构来进行的,通过航行于各大洲之间的英国远洋货轮来运输货物,并以英国的货币单位作为标准计算单位。”<sup>①</sup>而19世纪英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还不仅限于经济方面,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英国是这一时期世界体系内的霸权国。他指出:“国家间体系的霸权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所谓大国之间进行的竞争是如此的不平衡,以至于一个大国能将它的法则和意愿(至少通过有效的否决权)大部分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领域。”<sup>②</sup>霸权地位是实力和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同时英国又利用这种霸权地位来推动全球化进程,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但是霸权注定不能持久,因为它一方面会刺激国际体系内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制衡以及在经济上的竞争,另一方面会造成霸权国因为自身负担过多体系的义务而逐步丧失优势。到19世纪末,英国在后起的德美等国的竞争与大英帝国漫长战线消耗的双重压力下,从世界体系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了下来。

### (三) 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与国家主权的相互关系

在19世纪的全球化时期,全球化进程对主权国家的建构作用更为突出。

<sup>①</sup> 转引自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第54页。

<sup>②</sup>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全球化进程破坏了非西方世界许多古老国家事实上的主权,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即便是这种破坏过程也孕育着积极的建设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确实从不同角度强化了对国家主权的建构。这一方面表现为,全球化进程直接催生了一些新的主权国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美国本身就是17、18世纪全球化的产物。”<sup>①</sup>美国获得独立地位仅仅是一个序幕,到了19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西班牙、葡萄牙等老殖民帝国的衰落,美洲大部分国家都获得了独立。在欧洲内部19世纪中后期,德国获得统一并迅速崛起,随后意大利也获得了统一。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全球的传播对以后更多新主权国家的诞生做好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全球化进程不但塑造了新的主权国家,还为它们在国际体系中崛起提供了机遇。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19世纪,美国在政治上维护了国家统一的同时,充分利用全球化进程的机遇,一方面大力整合国内市场,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同时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到19世纪末期跃升成为世界强国。在这个过程中,外国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铁路系统在建设过程中就曾利用了数目异常庞大的英国资本”<sup>②</sup>。此外,美国还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为自己的发展需要融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当普遍地在欧洲出售他们的公债,用来建设铁路,铺设街道,或者为向西部迁移的居民创办学校系统。”<sup>③</sup>甚至连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靠的也是在英国发行公债筹集到的资金。

德国的道路与美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它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复杂而崛起的速度更为迅速。德国能够在19世纪后期迅速崛起,除了有赖于俾斯麦个人的卓越战略筹划之外,与19世纪后半期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机遇是分不开的。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世界市场需求以及大量外国资本的推动,德国能在20世纪初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

与前一个阶段一样,19世纪由国际体系内个别主权国家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反过来又造成了主权国家间激烈竞争的态势,但是这种竞争又在若干方面不

<sup>①</sup>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sup>②</sup> 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册(孙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0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771页。

同于以往,并最终催生了帝国主义。

如果说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靠个别君主的野心和商人、冒险家们的贪婪来驱动的话,那么 19 世纪以后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完全受资本扩张的逻辑支配,越来越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特别是到了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由早期的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围绕殖民地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竞争,确实关系到了它们的生死存亡。也正因为如此,17 世纪以来欧洲国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以外交手段协调控制国际冲突的机制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竞争面前彻底失灵了。

西方国家内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和种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对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族主义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中起到过革命作用,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来以后,它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出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都有意识地对民族主义加以利用,反过来说,这些国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起来以后,又对政府对外决策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评价一战前的德国时指出:“德国虽说相当专制,但其领导人却对民意极为敏感,受到民族主义压力团体影响甚深。这类压力团体几乎把外交及国际关系看作是运动比赛,总是逼促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兼并更多领土,开辟更多殖民地,建立更强大的陆军或海军。”<sup>①</sup>其实,类似的评价也同样适合英法等国。更有甚者,西方的民族主义恶性发展到顶点,就是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精神养料。有学者指出:“帝国主义不仅依赖民族自信,而且是它的最高成就。因为民族主义只有在其鼓吹者将其输入到外部世界,在那里那当地民族的成就来同自己的成就相比较,才会实现它的充分潜能,并且形成最强的情感引力……”<sup>②</sup>

另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引发了各国之间的全面军备竞赛,从而使军事领域的全球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在 19 世纪中期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战争出现了工业化的趋势。<sup>③</sup>这一趋势与列强间的竞争相结合,就造成了

①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2 页。

② 转引自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第 283 页。

③ 战争的工业化是指“将工业生产的方法和技术应用于战争武器与战争技术”。参阅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第 133 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战争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只是各国政府之间达成交易的工具,它越来越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它的破坏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这一时期军事领域的全球化仍只能算是暗流涌动,它积攒的能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才全面爆发出来。

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个“加长的”19世纪是全球化进程高歌猛进的阶段。全球化进程在经济、思想观念、军事等领域都出现了加速发展与深化的态势。但是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没有相应的制度来管理和控制它。这一进程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喧嚣中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再往前走就是万丈深渊。

#### 四、1914—1989年的全球化进程与国家主权

从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来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处于宏观上第三个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军事全球化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20世纪上半期有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下半期的冷战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世界大战,美苏两国军备竞赛程度之激烈、竞争波及地区范围之广都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当然,全球化进程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都不是单方面的,而各个方面的全球化进程的节奏也不尽相同。虽然相对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后期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水平而言,1914年到1945年期间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但是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文化观念领域的全球化则没有受到军事全球化的干扰。<sup>①</sup>另外,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广泛的国际制度安排,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新特点。大量国际制度的创设,对于调控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20世纪以军事全球化为突出特征的全球化既是前一个时期全

<sup>①</sup>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第88页。

球化进程中帝国主义竞争恶性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若干积极因素。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军事全球化和灾难后果摧毁了西方殖民体系的根基,为主权国家体系扩展到全球奠定了基础,使世界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大为加深,并推动主权国家创立国际制度来规范全球化进程。

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本身就包含了促使它走向毁灭的因素:列强的侵略激起了广大殖民地人民沉睡的民族意识,而西方的现代政治观念的广泛传播更推动了殖民地的民族觉醒。进入20世纪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聚集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列宁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期间都提出了殖民地的民族自决问题,正是对这股潮流的呼应。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严重消耗了列强的实力,暴露了它们的虚弱,西方白种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粉碎了。虽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直到二战结束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大功告成,但是支撑殖民主义大厦的支柱实际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坍塌了,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世界大战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余波。

民族解放运动中大批国家获得独立,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新成员,这对20世纪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国际体系的面貌为之大变。20世纪之前的国际体系一直都是西欧国家间的体系(充其量再加上美国、日本等少数几个其他成员),而到了20世纪中后期,国际体系的范围真正涵盖了全世界。其次,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亚非拉国家构成的第三世界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实力仍然相当有限,但是仍不失为国际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构成了对二战后超级大国的有力制约。另外影响尤其深远的一点是,获得民族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国际体系后,都格外重视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就有力地强化了国家主权作为现代国际体系基本规范的地位。换言之,新独立的国家不仅使国家主权原则成为真正普遍性的原则,而且它们对自身主权的珍视也有助于加强主权原则的有效性。

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任何地理上的屏障都已经很难保证国家或者个人的安全了。工业化时代战争形态的极致就是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总体战,各个工业化国家都变成了庞大的战争机器,普通百姓和军人一样都成为机器上的小齿轮。世界大战打响后,各国终于发现它们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是如此之深:

核武器的出现更使这种相互依赖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安全上的相互依赖是一种被动的相互依赖:比如,一旦别国掌握了核武器,不管本国是否有意与之敌,核武器的阴影都是挥之不去的:要么接受别国的核保护,要么采取措施应对其核威胁。同时,这种相互依赖又是带有高度敏感性和脆弱性的<sup>①</sup>:一国或许可以承受减少经济上和社会文化上相互依赖的代价,但是却很难承受与军事相互依赖有关的安全威胁。简而言之,军事全球化造成的安全上的相互依赖有一种“锁定”效应,各国很难摆脱这种相互依赖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虽然严重破坏和干扰了经济领域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又从另一个方向上把各个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军事全球化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使各国开始尝试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尝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了,国际联盟可算作早期的典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则使各国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在军事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自助方式和均势原则已经无力保障国家的安全,必须通过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达成这一目的。冷战时期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安排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涵盖整个国际体系的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联合国。与一战后的国联相比,联合国是一个真正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它吸收了国际体系中的所有主要大国,因而发挥了国联所无法比拟的稳定国际体系的作用。<sup>②</sup> 第二类是美苏两大阵营内部的制度安排,战后美国为了复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持创立了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sup>③</sup>;为了在军事上对抗苏联,成立了北约组织;为了协调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根据法国的倡议成立了西方六国(七国)首脑会议机制;苏联方面也大体创立了类似的制度安排,如华约、经互会等等。两大阵营内部,特别是西方阵营的这些制度安排,对于强化双方各自的内部认同、维护阵

<sup>①</sup> 关于相互依赖及其敏感性与脆弱性问题的详细讨论,参阅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0页。

<sup>②</sup> 这其中惟一的例外就是,联合国曾经非法剥夺了新中国的合法席位长达二十多年,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被迫两次卷入与美国的战争,而在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就再也没有卷入过与其他大国的武装冲突。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个包含国际体系内所有大国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对维护国际体系稳定(调控军事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重要作用。

<sup>③</sup> 这一类国际制度从本质上说也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普遍要求的,但是在冷战的条件下,由于世界经济被人为割裂开来,所以它们只能发挥局部性的作用。

营内部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类是美苏之间的制度性安排,美苏虽然表面上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但是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两个超级大国,双方自始至终又存在着合作和妥协的一面。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美苏就对战后的世界安排达成了雅尔塔协议,在冷战期间,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苏双方基本上都在默契地配合,维护雅尔塔体制。60年代,美苏两国为了防止冷战失控,还建立了双方首脑的“热线”机制。进入70年代后,美苏在“缓和”的旗号下,又展开了双边军控谈判进程。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制度性安排虽然数量十分有限,但是双方都能大体遵守。总的来看,在这三类制度安排中,第一类超越了两极结构,对维护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体系的稳定具有持久的影响力,第二和第三类则直接调控了冷战时期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全球化。特别是第二类国际制度为70年代之后经济领域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 五、结 论

通过回顾全球化进程在不同阶段对国家主权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若干规律性的特点:

在全球化进程中,当军事方面的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国家主权制度将会在一定范围内大量形成和扩展。其背后的动力机制一是国家(前国家政体)间军事竞争的压力,二是中心区部分国家在竞争中失败以后对其先前占据的边缘地区失去控制,从而使国家主权制度扩展到边缘地区。1500—1789年的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建构主要是依靠第一种动力机制,这一阶段国家主权制度主要局限在中心区;1914—1989年的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建构主要依靠第二种动力机制,这一阶段国家主权制度在边缘地区全面扩展。

当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时,国家主权制度的具体内容最容易发生变化,从其对内合法形式来看,国家主权制度将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从其对跨国界运动的控制程度来看,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面临着弱化的压力。1789—1914年是经济方面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一个典型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内出现了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的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人民主权全面取代了君主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对内合法形式。在国家主权对跨国

界运动的控制方面,经济全球化确实构成了重大挑战,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对跨国界运动的控制只是国家主权制度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受到挑战并不意味着主权制度面临根本性的威胁,更何况在很多情况下,主权国家是在有意识地放松自己对某些跨国界运动的控制。

由于本文的着重点在于对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建构作用的历史考察,因此对于20世纪末最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没有加以论述。但是本文的解释模型仍然适用于当下的全球化发展阶段,对于国家主权制度最近一系列的发展演变仍可以做出连贯统一的解释。首先,在国家主权形势的扩展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地区出现一系列新的主权国家,正是冷战时期军事全球化的余波,苏联在竞争中失败从而失去了对其边缘地区的控制,这不过是重复了19世纪初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中失败后拉美各国独立,以及奥匈帝国在一战失败后巴尔干各国独立的历史模式。其次,在国家主权对内合法性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体同步出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19世纪民主化第一次浪潮的模式。第三,在国家主权对跨国运动的控制方面,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欧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心区国家主权这方面内容在产生新的变化。正如19世纪欧洲率先出现了由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过渡一样,在新的经济全球化阶段,中心区的主权制度再次率先发生了演变。尽管这种变化尚在进行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主权制度变化的重要方面在于国家对跨国运动的控制大为弱化,甚至可以说,中心区国家的“相互依赖主权”有逐步消亡的趋势。

当前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并不仅仅是19世纪模式的简单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量国际制度的创设,成为影响全球化进程与国家主权相互关系的重要干预变量:这些国际制度一方面调解了全球化进程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另一方面也对国家主权制度造成了巨大压力。其结果就是:“传统的国家主权和自主概念正在被重新讨论和重现表述。而且,国家被锁定在多样的、复合的、重叠的政治领域中……因此,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必须被视为处在广泛的治理框架中。”<sup>①</sup>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把这种未来可能出现的

<sup>①</sup>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第612页。

具有重叠政治权威和效忠对象的国际秩序模式称为“新中世纪主义”<sup>①</sup>。当然,说当前全球化进程的后果必然会是新中世纪主义为时尚早,即使是在中心地区新中世纪主义也只是一种朦胧的状态而已。尽管面临新的挑战,国家主权制度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且,全球化进程中的主权国家绝不仅仅是被动的客体,各主权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将一如既往地全球化进程施加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www.cnki.net

---

①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第212—223页。

## 作者简介

**罗纳德·塔门 (Ronald L. Tammen)**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马克·汉菲尔德政府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1965年在太平洋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66年和1975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0); *The Economics of Defense Spending* (1975); *MIRV and the Arms Race* (1973)。

电子信箱:tammen@pdx.edu

**亚采克·库格勒 (Jacek Kugler)** 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协会主席(2004—2005),*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编辑。1965年和1967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73年在密歇根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0); *Parity and War* (1996);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1987); *The War Ledger* (1980)。

电子信箱:Jacek.Kugler@cgu.edu

**封永平**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03级博士生。1999年和2002年在河北大学获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afeng1989@163.com

**徐进**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4级博士研究生。1994年和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x-j04@mails.tsinghua.edu.cn

**邹明皓**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专业2002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pzyzmh@163.com

**李彬**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学教授。1985年和1988年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最新发表论文“China: A Crucial Bridge for the 2005 NPT Review Conference,” *Arms Control Today*, Jan./Feb. 2005;论著有《军备控制的理论与分析》(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子信箱:libin@mail.tsinghua.edu.cn

**陈昌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1997年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获学士学位;2003年在国防大学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chchsh@pku.edu.cn

**宋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译著有《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电子信箱:pkusongwei@yahoo.com.cn